

导论 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

0.1

问题的提出

9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

首先，人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人口增长甚至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长要快；我们为拥有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而自豪，又为农业发展的缓慢、食品供给的前景而不安；我们曾对“不发达”农业的巨大潜力而抱持希望，但又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农业增长 1 倍要比我们增长 10% 甚至更为容易。我们是农业国家却总是被吃饭问题所困扰。

对于这样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社会科学给予了什么样的回答呢？坦率地说，长期以来，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一直到经济学，不乏对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甚至不少人早已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到农民身上。但那是零碎的，不系统的，或者说还完全没有形成一种能够指导于实践的系统的理论。对有些文章，与其说是研究，倒不如说是对农民的指责与埋怨。什么传统文化的落后、思想的封闭与愚钝、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在他们的文章里经常可见。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 3/4 的大国里，人们对农业、农民问题研究的不够重视，以至产生出这样一种局面，是令人痛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为之而加倍努力的。本书试图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与现实资料和现象的分析，从

农户投资行为这个农民行动的“窗口”，窥见到一点能够与实际相符合的有用的东西。当然，我并不企求在此建立起一种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而只满足于能够在阻隔我们的小河中“添加几块涉水的石头”。

0.2

范畴与意义

农户，即是农民家庭，它是由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与绝大多数城市家庭不同的是，在我国农村，农户不仅是一种生活组织，更是一种生产组织；农户的行为也不只是个体的消费行为，而且是有组织的群体生产行为。所谓农户的投资行为，正是这种有组织的群体生产行为的主要方面。它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投放资金（或劳动）于生产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

农户投资行为，也是受某种动机驱使的，这种动机就是农户对利润最大化或对某种效用极大满足的一种需求。也就是说，它是农户对自己未来生产的一种预期。因此，它必然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从其内容上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应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以及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方式看，它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应包括投入的一种特殊形式——劳动积累。只有将以上几个方面加以综合分析，当代农户投资的整个活动过程才能真正被折射出来。

农户投资行为与农户经济行为，这两个概念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农户经济行为，是指农户个体或群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追求对某种效用极大满足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过程。它包括农户择业、投资、生产、销售、消费、储蓄行为等。农户投资行为，既是农户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又是农户经济行为的具体体现。而农户经济行为不仅决定着农户投资行为的方向、水平，并且它的其他行为方面对农户

投资行为也将施以重要的影响。因此，在问题分析中，我们将严格地将范围界定在农户投资行为上，但又不能完全离开农户经济行为这个大的范畴，而要把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分析，放到农户经济行为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

农户投资行为问题研究，是随着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土改至人民公社化之前的几年里，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极不发达，农户投资表现出较强的单一性，因此，也就不会存在问题研究的动因。人民公社化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20 多年里，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存在体，只是一个消费单位，独立经营的权力被剥夺，就连问题研究的前提也不存在。党的三中全会后，家庭责任制的实行，农户基本生产单位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有了基本生产资料和土地使用权，取得了独立经营权利；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农户在生产方面选择的幅度；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村引入了市场机制，它使农户作为一个层次的经营主体具备了更为完善的经济内容。因此，也就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和前提。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农村经济总量在 GNP 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9 亿农民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而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方面，是农户行动的“窗口”，因此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非常迫切。

(1) 研究、揭示农户投资行为的规律，对于创立家庭经济理论，发展家庭经济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家庭经济，是研究在一定社会形态和家庭形式制约下的家庭经济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科学。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的问世。这部古典经济学论著反映了奴隶主家庭的经济生活。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欧美产业革命后，在我国虽曾有家庭经济学著作（通常被称为家政学）流传于世，但由于资本主义

经济的不够发达，它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学科而发育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家政学研究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家庭问题的研究，从家庭理论、家庭结构、家庭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家庭生活的空间、时间结构与家庭生活组成要素，以及家庭发展的未来趋势等广阔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并有大批著作问世。

但遗憾的是，在这一研究中，对农村家庭的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尤为欠缺，更不用说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了。

我国关于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是 80 年代后期的事。自 1988 年先有陆一香^⑤、韩俊^⑥、冯海发^⑦、唐慧斌^⑧等同志对农户兼业投资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的分析好像重在说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存在的合法合理性，以及它的历史命运。而对其生成机理以及内部的规律性、各种约束条件、相关因素等方面的分析却明显不足。1990 年 4 月陈文水等^⑤首开农户投资行为研究的先河。之后，胡继连^⑥、马鸿运^⑦等对此也有专门论述，但他们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而很少进行经济学的分析。邹树林^⑧虽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户投资行为做了部分分析，但由于受篇幅所限，似有过于简单之感。近年来，《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也时常有一些文章提到农户投资行为

陆一香，论兼业化农业的历史命运，《中国农村经济》，1988 年，第 2 期。

韩俊，我国农户兼业问题探析，《经济研究》，1988 年，第 4 期。

冯海发，亦论兼业化农民的历史命运，《中国农村经济》，1988 年，第 11 期。

唐慧斌，《生存·改革·发展 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 年第 151 页。

⑤ 陈文水等，《中国农业投资研究与对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年 4 月。

⑥ 胡继连，《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2 年 7 月。

⑦ 马鸿运，《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6 月。

⑧ 邹树林，《中国农业投入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1994 年 7 月。

问题，但那只是零碎的、非系统的，还算不上是专门的研究。而家庭生产是家庭经济的重要内容，投资是生产的起点和开始。所以当我们要对家庭经济或农户经济进行研究，并加以理论上说明与概括的时候，就不能不对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一番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其结果将不仅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理论的意义也将是十分深刻的。

(2) 对农户投资行为的规律性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新鲜内容。在我国以前的理论研究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长期存在着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脱离的问题。如在理论框架上，重一般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的一般描述，而对微观经济以及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都明显不够。在对微观经济的研究上，包括近几年也很少有人将农户的经济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纳入整个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去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这正是我国日常经济学研究之不足。当前，在全国的家庭户中，农户已占近 70%；在储蓄中，农户已占城乡居民储蓄的 24.22%；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户已占 51%，在全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户已占 68.75%，可以说，农户投资行为与整个国民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农户投资即使提高或降低一个百分点，都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是小题大作，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的理论需要。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可能取得的任何一点进展和突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3) 对农户投资行为的规律性研究，将为农村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对待家庭，如何对待与家庭相连的小生产，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历史上，从欧洲的乌托邦到中国的太平天国，都

以下均为 1993 年统计数字。

企图想消灭家庭，但都失败了。从当代看，我国在大跃进期间，农村推行“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按军事化组织生产，搞平均主义分配，人人吃食堂，吃“大锅饭”，也企图使家庭早日消亡。结果经济大滑坡，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改革以来，每当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出现偏紧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的说法。有的甚至将我国 1984 年以后出现的粮食生产徘徊，农民收入减少的现象归结为由农民的趋利性、局限性而导致的投入减少所致，因此，想以此来否定家庭经营责任制。所以，开展这一研究，将农户投资行为搞清楚，将与此相关的决定因素弄明白，从而抽象出农户投资行为的规律性，这对我们今后正确对待农户，正确对待家庭经营，正确把握农村改革的方向，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有效合理的制度供给，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3

研究方法

本文在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分析过程中，试图以经济分析的方法作为基本方法。

“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① 美国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于世的加利·贝克尔曾经运用这些假定推出许多与经济分析有关的原理。例如，他认为，“价格上升会减少需求数量；鸡蛋价格上升会减少对鸡蛋的需求，子女的‘影子’价格的上升会减少对子女的需求。候诊时间的延长会减少对看病就医服务的需求，这是因为，候诊时间是看病就医服务的全部价格的构成部分”；“价格上升则增加供给的数量；牛排市场价格上升会增加牛的饲养与屠宰量，已婚妇女工资率的上升会提高她们的

^②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8页。

劳动参与，‘空车’时间的减少会提高出租车司机的实际价格，因而将增加出租车的供给”；“竞争市场比垄断市场更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对某种市场产出征税会减少这种产出”等。总之，他认为经济分析，适用于对人类行为的一切进行分析。他不限于物质产品与欲望，甚至也不限于市场领域。

这里有一个与我们过去的思维习惯所不同的问题是：经济分析的三个综合假定，暗含着“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的前提。如果我们运用这一假定，对中国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这在不少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一个传统的例子^①就是，传统小农经常缺乏作为现代企业家所具备的品质条件——储蓄。他们认为，传统小农的低储蓄倾向往往是由于小农不具有平衡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能力。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根据他的观察研究，提出了令人折服的观点：“传统的农民，所以没有储蓄习惯，是因为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传统的小农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已经把他们能支配的要求作了最佳配置，已经不能靠改变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增加这些传统要素的边际产出也很低，不值得传统小农省吃俭用来增加投资；但如果能够提供给传统小农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生产技术，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意愿也就会提高”。“许多传统小农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表现，恰好证明了传统小农在他们所面对外部限制条件下的理性行为”。

加里·贝克尔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还分析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长寿与抽烟问题。长寿与抽烟是一对矛盾，人人都希望长寿，但总有些人不愿放弃抽烟。他认为，每个人都存在一个适度的期望寿命，这时，增加年份的效用在价值上低于运用时间及其资源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3页。

②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3页。

获得这段时间而放弃的效用。因此，一个人也许宁做烟鬼而放弃身体锻炼。这倒不是因为他忽视这样做的后果或不懂得身体健康的价值，而是因为对他来说吸烟比身体健康更有价值。如果长寿是一种唯一目标，那么吸烟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只要其他目标存在，这样做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不失为明智的抉择。

有了以上的分析与说明，我们就不可能对当前有些农户在“边际效益低于边际成本时仍继续追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当比较收益低于其他生产项目时仍坚持从事粮食生产”^①的行为做出他们处于“非理性”的判断。而认为，他们的行动，恰恰是他们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作出的唯一可行的明智的选择。

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农户的投资行为，事实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当我们发现有些异于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标准现象时，就不能再简单地用行为者的愚昧无知、保守、缺乏商品观念等暗含行为是非理性的词语来概括。相反地，要对导致其产生不同于经典描述的行为原因进行认真地研究分析。这里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当我们发现，农户的投资行为与社会最优不相符合时，我们就应当对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进行改善，以不断地发挥政策对农户投资行为的激励作用。

这里还要着重说明的是，农户投资行为反映的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人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所反映的绝不只是个生产力的问题，还有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因此，在问题分析过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要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唯物的辩证分析方法运用于整个经济分析之中。

韩耀，中国农户生产行为研究，《经济纵横》，1995年第5期，第29~33页。

0.4

逻辑框架

本文是循着导论：关于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上篇：农户投资行为的现实描述——下篇：农户投资行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论：趋势演变与实践选择，这样一条逻辑线路进行的。因此不难看出，笔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在充分占有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占有材料的科学加工和制作，达到对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于工作实践的目的。

(1) 上篇是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现实描述。本篇共设置了三章内容：

第一章是对农户投资水平的现实描述。这里作者没有首先对农户投资水平进行总体描述，而是首先对农户的农业投资、非农业投资、劳动积累、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进行了分块的描述。其目的不是淡化总体，而是为了更好的把握总体。

作者认为，作为农户，农业投资是其投资的基本形式，而对于非农业投资却是农户投资的一种转移形式。还有一种形式，是要重点加以说明的，即是劳动积累。这本不应算作投资，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劳动积累实际上大多数是通过以工定值，以值顶工，工程实行叫标承包的方法完成的，对于农户已不是劳动形式的付出，而是一种价值形式的支付。所以，对此称其为农户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在下面的分析中，我还要将农户的劳动投入纳入我的分析之中，这里主要是从问题分析的科学性和其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出发的。因为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要素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舍去劳动因素，而孤立地分析投资，我们担心所得出的分析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部。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具有“影子”价格，是可以以价值形式进行计量的。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是农户用以维系家庭人口世代更替和不断延续的那部分投资，在统计资料里一般以家庭消费支出

而被列出。这里我们对其作为农户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加以考察，主要是因为他既是构成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同时又是农户对将来收益预期的一种成本付出。而试图通过对农户两种生产及其投资的全面考察分析，对两种生产的协调发展如何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得以实现的过程与规律有所发现，那才是我们最终的愿望和期冀。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农户投资的特征和结构上进行了总体描述，目的是为了对农户投资行为有一个较为完整、全面的把握，从而做出农户投资行为与社会最优是否符合的基本判断。

(2) 下篇是农户投资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其中也设置了四章内容。第四章想分别通过对我国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两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和实行家庭承包制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为以后结论中的基本判断准备材料，提供依据。

循着思维的逻辑顺序，第五章对制度外生性因素展开了分析：一是通过对现存家庭承包制下产权状况的考察，进而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二是对农户商品化兼业的生成机理以及行为特征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三是对政府“订购”价格下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四、五两节则分别对农民负担和粮食与收入增长的非均衡状况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五个方面的分析是上一章内容的进一步延伸，都是在证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要使农户投资行为与社会最优相符合，或要改变农户投资行为就必须从改变限制个人选择范围的外部条件入手，调整和完善农村的基本政策。

第六章将从文化角度，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即：通过分别对传统文化和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以真正体现出问题考察的全方位、多视角、科学性的特点。

第七章是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考察。在这里，作者

上 篇

农户投资行为的现实描述

农户投资水平的现实描述

1.1

农户投资的基本形式——农业投资

农户农业投资的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是升还是降，目前众说不一。为了真正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事物的本质，不妨让我们分别从“名义投资水平”，“实际投资水平”以及家庭经营费用与生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三个方面加以考察分析：

1.1.1 名义投资水平

名义投资水平即以货币形态反映的投资水平，它的数值包含着物价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对我国 1987—1995 年农户农业投资情况作一初步展示，见表 1.1-1。

表 1.1-1 全国农户农业现金支出水平

(单位：元/人)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农业投资额	66.42	117.11	137.62	142.82	164.84	181.06	205.92	288.52	404.07
比上年 增加额		50.69	20.51	5.20	22.02	16.22	24.86	82.60	115.55
比上年增加 (%)		76.32	17.51	3.78	15.42	9.84	13.73	40.11	40.05

此表中投资额不含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从表 1.1-1 可以看出，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一直保持上升的

势头，但多年间增长波动幅度较大，其中 1990 年增幅最少。

从农户种植业投资看，可以给我们以同样的认识，见表 1.1.2。

表 1.1-2 全国农户种植业现金投资水平*

(单位：元/人)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种植业 投资额	55.18	68.67	87.62	95.86	108.57	114.48	127.77	176.87	254.82
比上年 增加额		13.49	18.95	8.24	12.71	5.91	13.29	49.10	77.95
比上年 增加(%)		24.45	27.55	9.40	13.26	5.44	11.61	38.43	44.07

表中数据不含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同表 1.1-1。

山东省农调队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山东省农户在农林牧渔四方面投资的总水平。其基本趋势仍然是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也不平衡。增长幅度最大的是 1994 年，比 1993 年增加 162.20 元，最少的是 1990 年，比 1989 年增长 0.96 元，见表 1.1-3。

表 1.1-3 山东省农户农业投资水平*

(单位：元/人)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投资额	219.47	269.70	304.48	319.11	481.31	689.62	855.96
比上年增加额	0.96	50.23	34.78	14.63	162.20	208.31	166.34
比上年增加(%)	0.44	22.89	12.90	4.80	50.83	43.28	24.12

此表中投资额不含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山东省农调队《山东省分县乡农民生活统计年鉴》，《农调资料》。

从山东省农户种植业投资看，投资水平也是在波动中提高的，其中 1995 年增幅最大比 1994 年增加了 132.09 元，1993 年增幅最少，仅比 1992 年增了 10.28 元，见表 1.1-4。

表 1.1-4 山东省农户种植业投资水平^a

(单位:元/人)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投资额	126.43	166.48	185.24	195.52	283.78	415.87	549.39
比上年增加额	15.58	40.05	18.76	10.28	88.26	132.09	133.52
比上年增加(%)	14.06	31.68	11.27	5.55	45.14	46.55	32.11

表内投资额不含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山东省农调队《农调资料》,《山东省分县乡农民生活统计年鉴》。

农户投资变动曲线更清晰地反映了农户农业投资在上升中的变动过程,见图 1.1-1 与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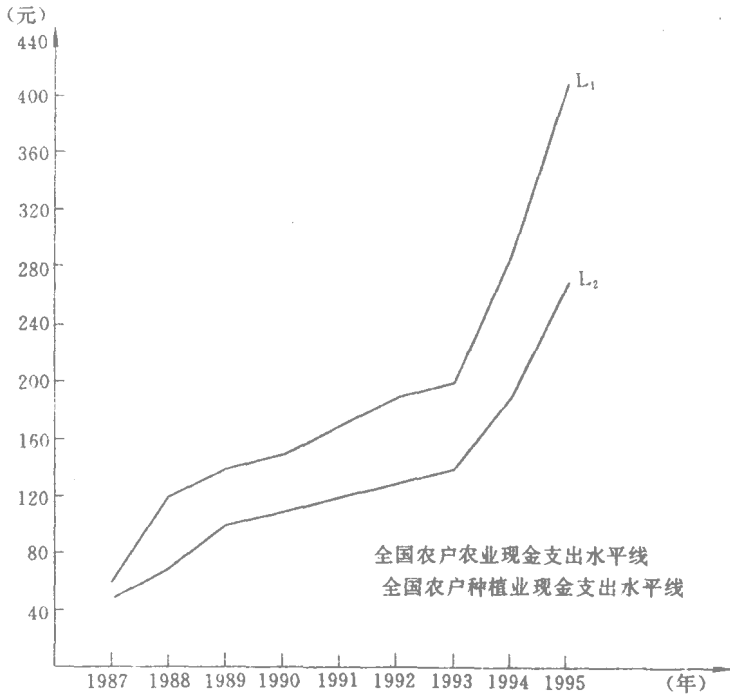


图 1.1-1 全国农业投资变动曲线